



第二次 国共合作史

(第一册)

THE SECOND K-C
COOPERATION
HISTORY

李蓉
叶成林 / 著

结社版社

李蓉 叶成林 / 著

第二次 国共合作史

(第一册)

THE SECOND K-C
COOPERATION
HISTORY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二次国共合作史 / 李蓉, 叶成林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26-5156-2

I. ①第… II. ①李… ②叶… III. ①国共合作—史
料—1936-1946 IV. ①K26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2014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 开

印 张: 74.5

字 数: 1366 千字

印 数: 2045

版 次: 2017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156-2

定 价: 198.00 元 (全四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1	绪论
27	<u>第一章</u>
	合作的酝酿过程（八一宣言至西安事变前）
29	第一节 中共倡导“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41	第二节 国民党秘密探寻同中共合作之路
79	第三节 中共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联合战线
99	第四节 国共两党中央直接对话
117	<u>第二章</u>
	正式确认合作关系（西安事变至国共合作宣言发表）
119	第一节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35	第二节 两党合作局面初步形成
148	第三节 两党正式谈判合作抗日
161	第四节 合作在多方面展开
184	第五节 国共合作宣言发表
209	<u>第三章</u>
	合作全面展开（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后至晋西事变前）
211	第一节 党际合作的谈判
235	第二节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略展开
266	第三节 中央政府层级合作

309	第四节	军事方面的合作
413	第五节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483	第六节	地方层级的合作
557	第四章	
	合作在曲折中前行（晋西事变至蒋介石林彪谈判前）	
559	第一节	抗日战场的战略配合
581	第二节	抗日战场战役层面的合作
618	第三节	为减轻两党摩擦的谈判
675	第四节	社会各界人士努力维护国共合作
702	第五节	中共中央为减轻摩擦所做的其他工作
737	第六节	其他方面的合作
791	第五章	
	持续合作取得伟大成果（蒋介石林彪谈判至抗战胜利）	
793	第一节	两党恢复正式谈判
810	第二节	进一步调整关系的谈判
831	第三节	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
881	第四节	其他多个方面的合作
933	第五节	坚持合作抗战直至胜利
965	第六章	
	新形势下继续合作（重庆谈判至全面内战爆发前）	
967	第一节	和平建国方针
977	第二节	重庆谈判
1009	第三节	政治协商会议
1031	第四节	停战谈判
1069	第五节	军调部调处军事冲突
1114	第六节	几个具体事务上的合作

1145

第七章

合作走向终结（全面内战爆发至宣布破裂）

1147

第一节 内战全面爆发后的交涉

1171

第二节 合作之门关闭

1178

后记

绪 论

- 一、文献的回顾与综述
- 二、系统考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
- 三、着重史料的掌握和运用
- 四、第二次国共合作进程的阶段划分
- 五、几点说明

文献的回顾与综述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国共两党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中国学者对此极为关注，很早就开始广泛收集资料，进行初步的历史考察，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随之展开。迄今为止，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已经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资料类、研究类、纪实文学类。

资料类著作按出版时间先后，主要有：马健著《国共合作史》（北社1946年印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1980年印行）、卓兆恒等编《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合编《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童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增订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湖北文史资料1985年第1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之一）》（1985年印行）、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研究室编《从和谈到北上抗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安徽文史资料第25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陈元方和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年出版）、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第33辑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南岳游干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 1992 年出版），潘启贵主编《国共合作事典》（大连出版社 1994 年出版）、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 ~ 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中共光泽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大洲谈判》（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出版）、中共沂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国共两军忻口抗战揭秘》（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出版）、周勇和潘洵主编《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重庆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等等。

研究类著作有：申伯纯编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出版）、刘云久著《第二次国共合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林家驹主编《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李淑嫔和肖学信编著《国共合作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杨世兰等著《国共合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西安事变研究会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唐培吉等编著《两次国共合作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张梅玲著《干戈化玉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秦野风等合著的《国共合作的过去与未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郝晏华著《从秘密谈判到共赴国难——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探微》（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出版）、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毛磊和范小方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张小满著《重庆谈判研究》（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张雪琴编著《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王延兴著《度尽劫波兄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台前幕后》（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出版）、杨奎松著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出版）、江西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编《庐山与第二次国共合作》（2010 年印行）；关中著《中国命运 关键十年——美国与国共谈判真相（1937 ~ 1947）》（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出版），以及王功安和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国共两党关系学术会议组织委员会编《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武汉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张广信主编《国共关系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李成山和马力主编《国共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苏仲波和杨振亚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张广信、周炜等主编《国共关系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王功安和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唐纯良和徐首军主编《国共关系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刘建武主编《国共关系七十年(1921.7 ~ 1991.7)》(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 年出版)、苏仲波等主编《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全国第三届国共两党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张铁男和宋春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历史与现状研究——全国第一届国共关系史研讨会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李良志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田克勤著《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王功安等主编《国共两党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 1996 年出版)、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北京出版社 1997 年出版)、黄修荣著《国共关系七十年》(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郭广迪等主编《国共关系中的传奇人物》(武汉出版社 2001 年出版)、黄修荣著《国共关系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马建离著《毛泽东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王功安著《周恩来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 2003 年出版)、马小芳著《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出版)、吕斌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关系问题研究》(华文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等等。

纪实文学类著作有:徐矛和石源华合著《国共合作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王淑珍著《同仇敌忾》(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柳建伟著《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王晓华等著《国共抗战大肃奸》(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5 年出版)、黄伟民等著《西京风云——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作家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吴子勇著《阅墙御寇——国共共赴国难纪实》(作家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李海文和铁竹伟合著《穿过硝烟的握手》(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梅剑主编《国共秘事——国共分合三部曲》(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叶永烈著《国共风云》(广州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潘强恩编著《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远方出版社 1998 年出版)、马谡著《国共和谈演义》(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出版)、戚如高主编《国共和谈秘梓》(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陈敦德著《合作在 1946——军调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

社 2004 年出版)、彭锦华著《和平之殇——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出版)、柳建伟著《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秘闻录》(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年出版)、郑健著《支点——国共山西合作抗战历史纪实》(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等等。

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报刊论文数以千计,仅本稿作者浏览过的就超过 3000 篇。

在这些著述中比较突出的成果是: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来看,对形成阶段研究得比较充分;就第二次国共合作所涉及的诸方面内容看,对国共谈判研究得比较充分;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看,对西安事变和重庆谈判研究得比较充分。

通过上述著述的考察,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将“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独立对象进行完整、系统研究的著作还是太少了——仅见到刘云久所著《第二次国共合作》。该书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有一个较完整的研究框架。该书的主目录是: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二、国共两党的抗日合作及其伟大历史作用,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但因该书出版于 1985 年,许多重要的史料都未能利用,特别是未能利用由孟广涵主编的《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一书提供的丰富史料;全书不足 100 页,仅约 7 万字。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样的大题目来说,其分量明显不足。

系统考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

基于以上考察，从历史的角度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的完整框架、给人们以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整的历史印象，就成为一项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工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第二次国共合作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历史走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有益的启示。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进行完整的、深入的考察，是历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三、

着重史料的掌握和运用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我们确定了研究目标后，如何实现目标的研究方法就成为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本书的研究方法，可以简单明了地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与时俱进，站在 21 世纪的高度审视历史事件。2005 年 9 月 3 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1]2014 年 7 月 7 日，习近平出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纪念活动时说：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军侵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侵略，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这里更强调“团结奋斗”、更重视“并肩战斗”。在“团结奋斗”、“并肩战斗”中，最重要、最为基础的是“国共两党的合作”。没有“国共合作”，何来的“团结奋斗”、“并肩战斗”，何来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阶级基础、指导思想、历史渊源、组织结构、现实地位都完全不同，而且之前还经历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斗争，其合作自然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有摩擦、有冲突，但在决定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关系的基调、主流仍然是合作。国共两党间的摩擦和

[1]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5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2005 年 9 月 4 日。

冲突的史实很多（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研究课题），但在本书中，主要着重于国共两党如何减轻、减缓摩擦与冲突，从而维持合作，坚持抗战。在国共谈判中，有达成协议的也有未达成协议的，本书更着重于达成协议的。国共两党间的摩擦和冲突只是作为背景交代。

（二）实事求是，重视史料的掌握与运用。史料是建筑史学大厦的基本材料，史料的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马克思就曾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1]。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2]史料相对于研究主题来说，可分为直接相关史料和非直接相关史料，关键性史料和非关键性史料。本书着重于那些直接相关的、关键性史料。对于史料的掌握与运用，我们尤其注意如下4个问题：

1. 史料的真实性。史料主要来源于文献的记载，但来自文献的史料是否可靠却是必须要研究确定的——这就是中国古人倡导的“实事求是”^[3]的治学态度和基本方法。我们不可能对每条史料都做仔细的考证，但对关键性史料也做了一些必要的考订，力求做到去伪存真。

在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一条关键性史料所做的考订工作。

许多历史书都说，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设立了“防共委员会”^[4]。我们认为，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在国共关系中，国民党设立“防共委员会”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情况，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认真的考证，以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在考察中，我们注意到如下情况：

（1）所有的如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中国政党史的辞典类工具书，都没有为“防共委员会”设专条。（2）所有提到有“防共委员会”的著作均对“防共委员会”的具体情况语焉不详，且没有注明来源文献。（3）许多著作都提到“防共委员会”的存在，但也有相当部分的著作，其中一些是很有权威性的著作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专题讲义（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1993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

[1]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

[2]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3] 《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4] 也有的书说成立的时间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91页：“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

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该书2005年出修订版），在记述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没有提到设立“防共委员会”事。

于是，我们认真细致地做了一番“考镜源流”^[1]的工作。首先考察“流”的情况，以“流”溯“源”。考察发现：（1）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均未提到有“防共委员会”的存在。（2）开始提到存在“防共委员会”的著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3）部分专家对此问题有从肯定到否定的变化。如：李新，1961年主编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3卷时，最早提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设立“防共委员会”事^[2]；2001年总主编出版《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时，删去了上述记载。又如张宪文，1985年主编出版《中华民国史纲》时记述有决定设立专门反共机构“防共委员会”^[3]；2005年撰写出版《中华民国史·第3卷》，在其第370页记述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情况时，也没有再提设立“防共委员会”的事。其次考察“源”。研究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这条史料的最可能的源头。该史料来源于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所公布的毛泽东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4]。

找到源头后需要做的是寻找其他旁证材料的支持。研究者经过查找，只发现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有一份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中有：“自国民党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在日前恶化，因为国民党七〔五〕中全会不仅公开拒绝我们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建议，而且通过了关于所谓预防共产主义危险直至溶化共产党即消灭共产党的秘密决议。为了与共产党人作斗争，国民党成立了以陈立夫、陈铎（音）、康泽、徐应、张冲为代表的专门小组。”^[5]这份电报是1939年6月4日发出的，也就是毛泽东作反投降报告之前几天时间，显然，这是毛泽东为

[1] 章学诚著，刘公纯标点：《校讎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2] 李新、彭明、蔡尚思、孙思白、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1页。

[3]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4] 《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提纲》，《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根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重排，1980年北京第3次印刷，第256页。该文后被编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

[5]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6月4日于延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44页。

作报告所准备的材料^[1]。除此之外，在毛泽东的文献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谈到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均没有再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设立“防共委员会”一事。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在重庆召开的。当时在重庆做国民党区工作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但在现在所见到周恩来所著的所有文稿中均没有提到有“防共委员会”事。1939年2月，周恩来有一份1.8万余字的关于国共关系的报告^[2]，其中没有提到“防共委员会”事。1939年12月周恩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长篇报告，其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部分长达1.3万余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中有千字左右专门论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政策”，其中论述了蒋介石“溶化共产党”、“防备共产党”、“限制共产党”，但没有“防共委员会”事。^[3]1945年4月，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其中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这样描述的：“五中全会是1939年1月武汉撤退以后开的。我们党在那个时候去了一个电报，态度是要求进步，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改革政府。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回答是，来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上原则通过，会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们军队，对边区，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活动等等，订了许多限制的办法。”^[4]其中也没有“防共委员会”事。

另外，仔细查阅过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档案的研究者也没有说其档案中存在“防共委员会”的记载。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公布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部分文件。该书编纂者在《编者说明》中

[1] 时在莫斯科的任弼时根据这个材料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的发言时说“组建了一个专门用于共产党活动的委员会”，但没有用“防共委员会”的说法。《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第二号记录（摘录）》（1939年7月5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2] 《周恩来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12页。

[3] 《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摘录）》（1939年12月29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307～309页。

[4]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